

新型城镇化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理论分析与经验辨识

吴青山 吴玉鸣 郭琳*

摘要: 本文从劳动力错配视角入手,以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新型城镇化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劳动力错配存在显著的缓解作用,且经过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人口规模较小等地区劳动力错配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优化劳动力结构和加快劳动力流动是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发挥缓解效应的主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劳动力错配;劳动力结构;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 F291.1;F241.2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优化要素资源空间配置是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等粗放式发展固然能加速经济增长,但其带来的市场结构失衡、供需不对称、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政府主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之一。2014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1个部门公布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名单,并在2015年、2016年陆续扩大试点范围,目前综合试点地区范围包含27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个城市(区、县、镇)。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选择考虑了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兼顾各种类型的城市进行试点。

在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依据市场规律自主流向边际产出或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企业,达到劳动力市场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于劳动

*吴青山,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330013,电子信箱:wuqingshan@mail.ecust.edu.cn;吴玉鸣(通讯作者),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330013,电子信箱:wuyuming@ecust.edu.cn;郭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330013,电子信箱:guolin@mail.ecust.edu.cn。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72073045)的资助。非常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力市场而言,劳动力错配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市场扭曲,特别是户籍制度内生的制度壁垒,严重扭曲劳动力在地区间的市场配置,导致劳动力跨地域配置存在制度障碍。一方面,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因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受到限制,导致劳动力市场扭曲,进而影响劳动力错配程度;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可能导致劳动结构不合理,劳动力与企业之间的匹配概率下降,劳动力市场发生严重扭曲,加剧劳动力错配状况。作为劳动力再配置的重要方式,“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能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集聚优质生产资源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而且还能加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消除劳动力跨地域配置制度障碍,加快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然而,新型城镇化能否缓解劳动力错配,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如何? 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城镇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劳动分工效率提高、交易费用降低和厚劳动力市场形成,从而使得城市生产率得到提高。城镇化提升城市生产率的原因主要归类为集聚效应(Melo et al., 2009)和选择效应(Baldwin and Okubo, 2006; Okubo et al., 2010)。李晓萍等(2015)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同时发挥了正向作用。余壮雄和李莹莹(2014)则从要素流动视角研究发现规模效应也是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主要渠道。中国城镇化进程方向正在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优化资源空间配置”驱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劳动力错配是一个相对概念,即是相对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偏离。当劳动者依据就业机会和劳动力相对价格,选择从低生产率的地区或产业自由流入高生产率的地区或产业,此时劳动力市场配置偏离度变小,能有效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如何度量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错配程度以及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众多学者展开了研究(Restuccia and Rogerson, 2008; Hsieh and Klenow, 2009; 陈永伟, 胡伟民, 2011; 袁志刚、解栋栋, 2011; Thi and Khac, 2019)。此外,部分学者基于多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熊湘辉、徐璋勇, 2015)、改进的熵权法(于斌斌、陈露, 2019)、TOPSIS和灰色关联(赵磊、方成, 2019)等方法测度省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综上,目前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城镇化的生产率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但新型城镇化是否有助于缓解劳动力错配问题,较少有文献涉及。其中,与本文最相关的研究文献是张军涛和黎晓峰(2019),他们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行业生产率分布视角探讨城镇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城镇化通过要素流动效应、进入退出效应和扩散效应显著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且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文献基于城乡一体化(刘心怡、梁祎玲, 2018)、经济发展质量(郭晨、张卫东, 2018)、经济增长(姜安印、杨志良, 2020)等视角,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尽管上述研究已对该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仍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性:(1)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多维视角构建指标体系,无法精准度量新型城镇化内涵。尽管已有文献从多角度识别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评估效果,但尚未有研究文献从要素错配方面的视角出发,衡量其是否缓解了劳动力错配状况;(2)部分文献仅从理论上分析影响机制渠道,并未进行实证检验;亦或仅从微观视角检验其机制渠道,并未从宏观视角考虑其内生机制。鉴于此,本文可能存在以下边际贡献^①:(1)在研究视角

^①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将边际贡献与以往文献不足之处一一对应。

上,本文从劳动力错配视角拓展了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有益补充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评估视角,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缓解要素错配具有重要意义;(2)在研究内容上,从优化劳动力结构和加快劳动力流动两个宏观视角,探索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缓解劳动力错配的内在机制,并识别了试点政策的异质性效应。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作用机制,第六部分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一) 新型城镇化与劳动力错配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表1梳理了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政策。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深化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公布了首批包含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区、县、镇)的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随后,2015年、2016年分别公布了第二批73个城市(区、县、镇)和第三批111个城市(区、县、镇)。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核心”,优化资源配置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表1 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梳理

发布时间	相关政策	主要内容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报告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
2012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4年3月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4年12月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	鼓励试点地区从推进新型城镇化实际出发,在……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改革探索。
2019年3月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2020年4月	《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加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缩小城市间的城镇化率差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及集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等,这将有利于发挥地区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一方面,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有利于集中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形成“劳动力蓄水池”(季书涵、朱英明,2017),发挥劳动力市场集聚的规模效应。与此同时,厚劳动力市场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劳动力交流障碍,提升企业与劳动力的匹配概率,优化劳动力市场空间配置。另一方面,劳动力集聚加强企业间和企业内部员工交流学习,发挥高素质劳动力的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优化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空间配置

效应(崔书会等,2019)。此外,新型城镇化有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高素质劳动力转移,为其提供更合适的就业岗位,从而提升高素质劳动力利用效率,缓解地区间劳动力错配程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任务要求是:加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劳动力要素突破行政区划障碍,从而提高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H1: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有利于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

新型城镇化对劳动力错配的缓解效应也可能因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开放度较大,且当地企业有着先进的研发技术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企业职工工资薪酬通常较高,劳动力配置更为合理,因此东部城市的劳动力错配程度较低(梁泳梅等,2011)。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选择尽管考虑了诸多因素,但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多,因此试点地区的劳动力错配程度相对更为严重。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进而增加城市劳动力数量,且弱化劳动力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从而增加劳动力与企业的匹配机会,提升劳动力就业概率和优化劳动力空间配置(盛丹、王永进,2013)。相对而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和劳动力具有更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使得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错配的缓解效应不明显。

新型城镇化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效应存在差异性。一般而言,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工作机会越多,劳动力生产率更高,但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也更为严格,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众多公共福利,因此需要承担更多的流动成本和迁移成本(Tombe and Zhu, 2019)。城市户籍制度引致的人口流动壁垒尚未破除,且大城市的劳动力流入壁垒大于中小城市(王丽莉、乔雪,2020),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相对大城市而言,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更有助于尽早消除人口流动壁垒,使得劳动力有效配置到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部门,完善和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从而缓解劳动力错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H2:相对而言,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更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规模较小等地区的劳动力错配状况。

(二) 劳动力结构与劳动力错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理论上劳动力应按照第一、二、三次产业依次流动,但实际配置却出现较为明显的错配现象,如第三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二产业劳动力不足等,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产业对劳动力教育结构和技术水平有不同的需求,因而需求较高的第二产业无法吸纳充足的劳动力。在劳动力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出现“过剩”和“失业”并存的现象,即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顾和军等,2015)。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为应对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必须重视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提升,加大教育投入以便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于斌斌和陈露(2019)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仅要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更加需要注重城镇人口素质的提升,积累优质的人力资本。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不仅意味着企业能够招聘优质的员工,进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还意味着劳动力能通过提升自身技能水平,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报酬,从而降低劳动力市场“过剩”与“失业”并存的现象,缓解劳动力错配现象,尽可能使得劳动力处于市场出清状态。因此,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有助于加速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自身技能提高和劳动力结构优化,从供给侧角度缓解劳动力在空间配置上的错配状况,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H3: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 优化劳动力结构, 从而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

(三) 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错配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实现要素自由流动, 使得要素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城市间、城乡间的跨区域自由流动有利于要素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优化, 因此消除阻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政策制度是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袁志刚、解栋栋, 2011)。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加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破除阻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制度壁垒, 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 促进劳动力集聚和扩大劳动力市场范围, 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李兰冰、刘秉镰, 2020), 合理配置生产要素, 缓解劳动力市场的错配状况。此外, 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优化区域经营环境, 推动产业集聚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与此同时,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劳动者可以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 降低劳动力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 以匹配适合劳动者自身的工作岗位, 实现劳动力再配置(Braakmann and Vogel, 2011), 从而降低劳动力错配状况。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

假说 H4: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通过加快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流动性, 使得劳动要素实现合理报酬, 从而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计

本文旨在研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是否能够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 而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作为一种政策评估的常用方法, 基于一个反事实的框架来评估政策发生和不发生这两种情况下被观测因素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内生性问题的困扰。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 试点政策的冲击将研究样本分成处理组(进入试点名单的城市)和对照组(未进入试点名单的城市), 剔除不可观测的因素后, 通过考察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变化与对照组变化的处理效应, 从而识别试点政策实施的评估效果。已有文献从城乡一体化、城市经济增长等视角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效应(刘心怡、梁祎玲, 2018; 郭晨、张卫东, 2018; 姜安印、杨志良, 2020)。本文将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等第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范围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①, 其他地级市则是作为对照组, 量化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考虑第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实施时间不一致, 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不适合本文研究, 故参考 Beck 等(2010)的研究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具体形式如下:

$$\tau_{it} = \beta_0 + \beta_1 D_{it} + \rho Control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1) 式中: τ_{it}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劳动力错配指数。 D_{it} 表示本文的 DID 估计量^②, 若同时满足“城市 i 为试点城市”与“时间 t 为政策实施当期及之后”, 则取值为 1, 其他情况取值为 0。 $Control_{it}$ 表示可能影响城市劳动力错配的控制变量, 包括人口密度(Density)、政府干预程度

^①在第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中, 若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覆盖整个地级市, 则该地级市为处理组样本; 反之, 若只是在某个区、县、镇进行试点, 则在本文不作为处理组样本。在本文研究样本中, 处理组有 85 个城市, 对照组有 200 个城市。

^②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区分多期 DID 与传统 DID 的估计量表述。

(Government)、产业结构(Structure)、经济发展水平(PGDP)、消费能力(Consumer)。此外, μ_i 和 η_i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用以控制不随样本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

在基准分析中,重点关注 D_{it} 的估计系数 β_1 ,衡量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错配的冲击程度。若 β_1 显著为负,则表明试点政策有助于缓解城市的劳动力错配状况。

(二) 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劳动力错配指数

在现实中无法观测要素最优配置状况,即难以直接度量资源错配程度。Restuccia 和 Rogerson(2013)指出基于某种扭曲或将扭曲以税收楔子的形式加到价格上,从而对资源错配指数进行测度。因此,本文借鉴陈永伟和胡伟明(2011),依据劳动力价格扭曲系数对劳动力进行测度,具体公式如下:

$$\tau_{it} = \frac{1}{\gamma_{it}} - 1 \quad (2)$$

(2)式中: γ_{it} 表示劳动力价格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情况下该数据不能直观得到,只能通过估计劳动力价格相对扭曲系数 $\hat{\gamma}_{it}$,具体公式如下:

$$\hat{\gamma}_{it} = \left(\frac{L_{it}}{L_t} \right) \bigg/ \left(\frac{s_{it} m_i}{m_t} \right) \quad (3)$$

(3)式中:分子 L_{it}/L_t 表示城市 i 在第 t 年时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实际比例;分母 $s_{it} m_i/m_t$ 表示城市 i 在第 t 年时劳动力处于最优配置时的理论比例; $s_{it} = p_{it} y_{it}/Y_t$ 表示在第 t 年时城市 i 实际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其中 p_{it} 表示产品市场价格, y_{it} 表示产品实际产量, Y_t 表示第 t 年的社会总产出; $m_t = \sum_{i=1}^N s_{it} m_i$ 表示第 t 年各城市劳动力贡献度的加权值。通过比较二者的比值,可以有效衡量各地区劳动力实际投入与理论最优投入的偏离程度,从而测算出劳动力错配指数 τ_{it} ,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tau_{it} \begin{cases} >0 & \text{当劳动力实际配置不足时} \\ =0 & \text{当劳动力实际配置有效时} \\ <0 & \text{当劳动力实际配置过度时} \end{cases} \quad (4)$$

为了估计劳动力价格相对扭曲系数,必须先估计各城市的劳动力产出弹性 m_i 。本文参考赵志耘等(2006)的做法,采用索罗余值法对劳动力产出弹性进行估算,具体形式如下所示:

$$\ln(Y_{it}/L_{it}) = \ln A + \beta_i^K \ln(K_{it}/L_{it}) + \mu_i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5)$$

产出变量(Y_{it})以2003年为基期经过平减后得到的实际GDP来表示;劳动力投入量(L_{it})以各市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与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之和来表示;资本投入量(K_{it})基于永续盘存法 $K_t = I_t/P_t + (1-\delta_t)K_{t-1}$ 进行估算,设定 $\delta_t = 9.6\%$, I_t 表示第 t 期投资额, P_t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固定资本存量基期估算参考公式: $K_0 = I_0 \left[1 + \frac{1-\delta}{1+g} + \left(\frac{1-\delta}{1+g} \right)^2 + \dots \right] =$

$I_0 \left[\frac{1+g}{\delta+g} \right]$, g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由于各城市要素产出弹性可能不同,因此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的研究方法,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LSDV)对劳动力产出弹性($m_i = 1 - m_i^K$)进行估计。不论劳动力错配指数是大于0还是小于0,劳动力实际配置均没有

达到最优状态,因此参照季书涵和朱英明(2017)的做法对劳动力错配指数取绝对值处理。

2.控制变量

考虑到城市层面的其他因素可能对劳动力错配带来一定程度的潜在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选取了可能影响劳动力错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1)人口密度(*Density*)。地区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口的集聚程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吸引高技术人才,提升员工素质,优化劳动力结构;另一方面,人口密度越高,地区公共服务压力越大,促使当地政府出台一些政策阻碍要素流入,加剧劳动力错配状况。本文采用年末总人口与行政土地面积的比值取对数衡量人口密度。(2)政府干预程度(*Government*)。一方面政府干预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使得其市场配置出现失灵;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支出有助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当地,改善劳动力结构,因此,政府干预程度影响劳动力的再配置。本文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例衡量政府干预程度。(3)产业结构(*Structure*)。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源要素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动态有效配置,因此劳动力的再配置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升级。(4)经济发展水平(*PGDP*)。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薪资报酬,有利于加强对优质劳动力的吸引,从而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劳动生产率。本文采用人均GDP取对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5)消费能力(*Consumer*)。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者的消费购买能力和多元化需求,有利于倒逼企业更新产品设备和优化劳动力结构。本文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GDP的比例衡量消费能力。

各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统计结果显示处理组的劳动力错配指数平均值为0.4316,显著低于对照组的0.4598,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劳动力错配的缓解作用。

表2 基本统计信息

变量	全样本			处理组			对照组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τ	4 560	0.4514	0.4000	1 360	0.4316	0.3935	3 200	0.4598	0.4025
<i>Density</i>	4 560	5.7219	0.9134	1 360	6.0285	0.7465	3 200	5.5917	0.9462
<i>Government</i>	4 560	0.1651	0.0949	1 360	0.1463	0.0899	3 200	0.1731	0.0958
<i>Structure</i>	4 560	0.8919	0.4549	1 360	0.8464	0.3364	3 200	0.9113	0.4955
<i>PGDP</i>	4 560	9.9873	0.8410	1 360	10.1435	0.8582	3 200	9.9209	0.8249
<i>Consumer</i>	4 560	0.3590	0.1023	1 360	0.3600	0.0899	3 200	0.3586	0.1072

(三)数据说明

本研究选取样本为2003—2018年285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CEIC数据库,对于部分变量的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插值补齐。此外,对于2016—2018年的人口密度变量采用年末总人口与行政土地面积的比值并取对数衡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新成果,以统筹兼顾为原则,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乡一体化,城市现代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使地区间劳动力市场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本文采用多期DID方法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错配影响的估

计结果如表3所示。第(1)、(2)列分别是不考虑控制变量和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不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 D 的估计系数均至少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回归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地区的劳动力错配指数显著降低。以第(2)列为例,当地区实施新型城镇化政策后,劳动力错配指数显著降低了0.0437,相当于全样本劳动力错配指数均值的9.68%^①。因此,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试点地区劳动力错配状况。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试点地区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政策后,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加快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提高劳动力与企业之间的匹配概率,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错配程度;二是实施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合理配置人力资本,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结构,进而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错配程度。至此,假说H1得到验证。

由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能显著缓解劳动力错配,这是因为人口密度提升,市场集中度提高,加剧市场竞争程度,有利于劳动力从低生产效率行业转向高生产效率行业,从而提升劳动力效率,降低劳动力在城市间、行业间的配置扭曲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干预市场对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扭曲效应”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缓解效应”相抵消。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消费能力显著加剧了劳动力错配,原因在于当前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够合理,使得劳动力要素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反而加剧了劳动力错配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人才的吸引力越高,导致当时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饱和状态,从而损失了部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劳动力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城市消费能力刺激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提升员工薪资报酬,影响企业研发能力,不利于企业技术升级和劳动力结构优化,加剧劳动力错配现象。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τ	
	(1)	(2)
D	-0.0262* (0.0144)	-0.0437*** (0.0144)
$Density$		-0.2603*** (0.0701)
$Government$		-0.0179 (0.0891)
$Structure$		0.0341** (0.0173)
$PGDP$		0.5031*** (0.0528)
$Consumer$		0.1727** (0.0846)
常数项	0.4526*** (0.0120)	-2.7263*** (0.6533)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560	4 560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①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阐述DID估计系数的经济学含义。该百分数由DID的系数除以全样本的均值得到,即 $0.0437 \div 0.4514 \times 100\% = 9.68\%$ 。下同,不再赘述。

(二) 识别假设检验

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是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有效的的基本前提,以保证估计量的无偏性。为检验这一假设,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动态效应进行检验。由于试点地区的政策实施时间不唯一,因此不能固定某一时间作为临界点,多期 DID 的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与 DID 有所不同,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tau_{it} = \alpha + \sum_{k=-9}^{\geq 2, k \neq -1} \beta_k D_{it}^k + \beta \text{Control}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6)式中: k 表示实施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城市在第 t 年时距离政策实施年份的年份时长,比如 $k=-1$ 表示试点城市实施政策的前一年, $k=1$ 表示试点城市实施政策的后一年,而 $k \geq 2$ 表示试点城市实施政策的后二年及以上。 D_{it}^k 是时间虚拟变量和政策处理变量的交互项, β_k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参数。

图1绘制了90%置信区间下参数 β_k 的估计值。由图1可知,在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参数 β_k 的估计值均不能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在试点政策之前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的劳动力错配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前提假设。在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参数 β_k 的估计值始终显著为负且其绝对值逐步增大,这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劳动力错配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且缓解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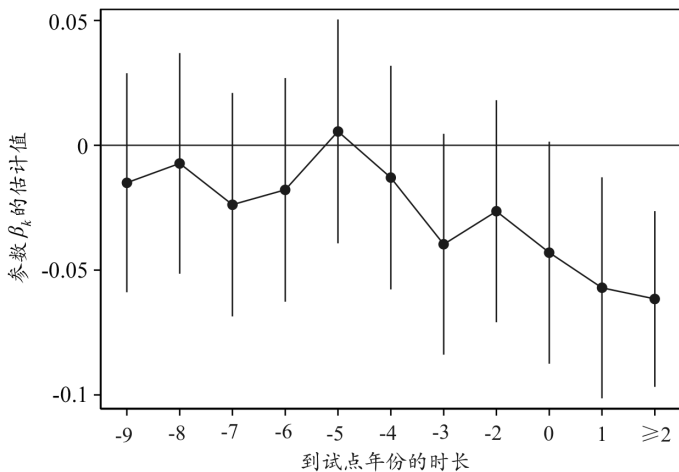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结果

2. 安慰剂检验:不受非观测因素影响

关于双重差分模型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非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干扰,采用随机抽取城市和随机抽取年份分别作为试点城市和政策时间来进行间接安慰剂检验。根据(1)式可得 $\hat{\beta}_1$ 的估计表达式如下:

$$\hat{\beta}_1 = \beta_1 + \theta \frac{\text{cov}(D_{it}, \varepsilon_{it} | \text{Control}_{it})}{\text{var}(D_{it} | \text{Control}_{it})} \quad (7)$$

(7)式中: θ 表示非观测因素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若 $\theta=0$ 表示非观测因素对试点政策的评估效应不会产生干扰,即 $\hat{\beta}_1$ 估计是无偏的。然而,并不能对 $\theta=0$ 进行直接验证,因此采用

间接安慰剂检验的方法。基于计算机模拟寻找在理论上对劳动力错配不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变量取替代 D_{it} ,也即使得 $\beta_1=0$ 。此时,若要使得 θ 满足条件 $\theta=0$,则参数 $\hat{\beta}_1$ 的估计值必须为零。为了提高间接安慰剂检验可识别性,使得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特定地区的政策冲击变得更加随机,本文将随机过程重复500次,图2展示了参数 $\hat{\beta}_1$ 的概率密度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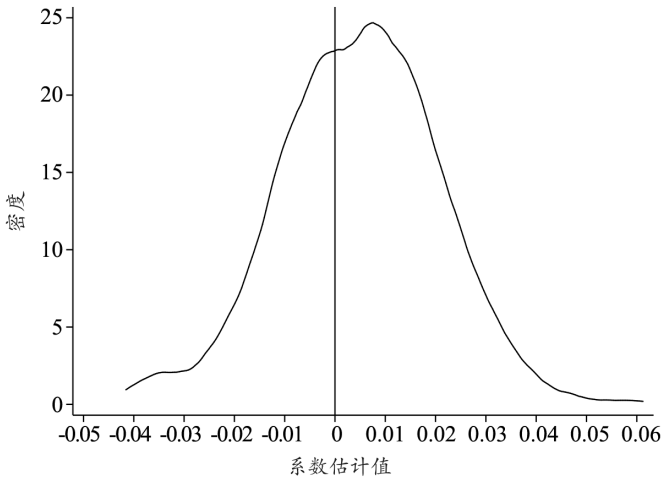


图2 随机处理后的 $\hat{\beta}_1^{random}$ 的分布(安慰剂检验)

由图2可知,参数 $\hat{\beta}_1$ 在500次随机模拟过程中的估计值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估计值集中在零的附近,因此反推可得 $\theta=0$,说明非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程度几乎为零,表示多期DID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即新型城镇化对劳动力错配的缓解作用合理有效。

(三) 异质性分析

1.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劳动力错配缓解效应具有不同影响。因此,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按照人均GDP的大小将样本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①,以探析试点政策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错配的缓解效应有何差异。

表4报告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第(1)列 D 的回归系数尽管为负但不显著,第(2)列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在研究时期内地区劳动力错配指数降低了9.37%,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缓解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劳动力错配。可能的原因如前文所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劳动力错配程度更低,且需求更多的是高层次人才,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带动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流入这些地区,并不能缓解劳动力错配。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更有利于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因此对其劳动力错配的缓解效应更加明显。

^①将人均GDP大于等于平均值的城市定义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类别,而人均GDP小于平均值的城市则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类别。

表 4 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τ	
	(1)	(2)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
<i>D</i>	-0.0369 (0.0251)	-0.0423** (0.01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9418*** (1.1577)	-1.1708*** (0.8327)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505	3 055

2. 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劳动力错配缓解效应具有差异性。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按照城区常住人口^①规模大小划分为两类,一类依据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划分^②,另一类依据城市人口规模是否高于平均值进行划分^③,从而衡量试点政策在不同人口规模城市下对劳动力错配的缓解效应是否不同。

表 5 汇报了不同人口规模城市下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第(1)列、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大、中、小三类城市的子样本回归结果,第(4)列和第(5)列则是将样本分成大城市和非大型城市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中、小型城市和非大型城市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在研究时期内地区劳动力错配指数分别降低了 30.12%、56.23%和 16.63%,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缓解了中、小型城市的劳动力错配,且在小城市的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大城市流入壁垒大于中小城市,且试点政策对推动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更加有效,从而降低流动壁垒,缓解劳动力错配。至此,假说 H2 得到验证。

表 5 城市人口规模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τ				
	(1)	(2)	(3)	(4)	(5)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大城市	非大城市
<i>D</i>	0.0060 (0.0180)	-0.1360*** (0.0312)	-0.2539*** (0.0538)	0.0366 (0.0244)	-0.0751*** (0.01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9187 (1.0842)	-3.7818*** (1.2025)	-5.7298*** (1.3223)	1.9419 (1.387)	-3.2813*** (0.7674)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145	1 616	796	1 160	3 400

①《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人均 GDP 在 2005 年之前是按照户籍人口统计的,2005 年及之后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因此,在本文中 2005—2018 年的常住人口是用 GDP 与人均 GDP 的比值来衡量,而 2003 年与 2004 年则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②参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将样本城市中年末市辖区常住人口小于 50 万人的城市划分为小城市,50 万~100 万人的城市划分为中等城市,100 万人以上的城市划分为大城市。

③将常住人口大于平均值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类别,而小于平均值的城市则为非大城市类别。

五、作用机制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有利于缓解劳动力错配,且试点政策的劳动力错配缓解效应存在不同维度的异质性。那么,这种政策效应是通过何种影响机制实现的呢?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可能会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和加快劳动力流动两种机制渠道作用于劳动力错配,对此,本文将进一步展开详细讨论。

为了检验新型城镇化通过加快劳动力流动和优化劳动力结构进而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的内在机制作用,本文将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两种机制作用进行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M_{it} = \alpha_1 + \delta_{11}D_{it} + \rho Control_{it} + \theta_i + \omega_t + \varphi_{it} \quad (8)$$

$$\tau_{it} = \alpha_2 + \delta_{21}D_{it} + \delta_{22}M_{it} + \rho Control_{it} + v_i + \zeta_t + \psi_{it} \quad (9)$$

其中: M_{it} 为中介变量,即是本文的机制变量,分别为劳动力流动(LM_{it})和劳动力结构(LS_{it}),其余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中介效应检验主要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考察公式(1)中 D_{it} 的估计参数是否显著,由上文估计结果可知,存在显著的总体效应;其次,对模型(8)和模型(9)进行回归估计,本文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值及显著性;最后,根据估计系数 δ_{11} 、 δ_{21} 和 δ_{22} 的系数值和显著性判断中介变量的有效性。在 δ_{11} 和 δ_{22} 都显著的前提下,若 δ_{21} 显著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反之,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 δ_{11} 和 δ_{22}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 Sobel 检验进一步判断中介变量的有效性。

(一) 优化劳动力结构

本文参考季书涵等(2016)采用衡量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方法代替劳动力结构,即:劳动力结构=劳动力报酬/劳动力产出贡献。本文将在岗职工总工资作为衡量劳动力报酬的代理变量;将总产出剔除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的产出贡献,得到劳动力产出贡献。对两者比值进行对数处理,得到劳动力结构的代理变量,记为 LS_{it} 。 LS_{it} 值越大,则说明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越高,也就说明劳动力市场中熟练工比例越高,有助于优化劳动力结构。

表6汇报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影响劳动力错配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6 劳动力结构机制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1)	(2)	(3)
	τ	LS	τ
D	-0.0437*** (0.0144)	0.0918*** (0.0119)	-0.0230 (0.0143)
LS			-0.2260*** (0.01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560	4 560	4 560
Sobel 检验	Z = -3.402, P = 0.0007 < 0.01		
Bootstrap 检验	Z = -3.620, P = 0.000 < 0.01		

表6第(2)列和第(3)列显示了中介效应模型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检验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以及劳动力结构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 D 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也即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实施有助于优化劳动力结构;第三阶段估计结果表明,中介变量 LS 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也即劳动力结构优化有利于缓解劳动力错配。进一步分析,结合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①的结果可知,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也就是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进而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原因在于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城镇人口素质的提高,优质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劳动力熟练度不断提高,从供给侧角度缓解了劳动力在空间配置上的错配状况,实现劳动力优化再配置。至此,假说 H3 得到验证。

(二) 加快劳动力流动

本文参考卞元超等(2018)采用引力模型对劳动力流动进行测算,选取城市间工资差距与房价差距作为引力模型的基本指标。具体测算步骤:第一步,测算劳动力从城市 i 流动到城市 j 的数量 $LM_{ij} = \ln L_i \times \ln(Wage_j - Wage_i) \times \ln(House_j - House_i) \times D_{ij}^{-2}$,其中 L_i 表示城市 i 的劳动力数量, $Wage_j$ 和 $Wage_i$ 分别表示城市 j 和城市 i 的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 $House_j$ 和 $House_i$ 分别表示城市 j 和城市 i 的住宅平均销售价格, D_{ij} 则表示城市 i 和城市 j 之间的地理距离;第二步,将其他所有城市流动到城市 j 的劳动力数量加总 $LM_j = \sum_{i \neq j}^N LM_{ij}$,从而得到每个城市历年的劳动力流动数量,且取对数处理。

表7汇报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通过加快劳动力流动影响劳动力错配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7 劳动力流动机制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1)	(2)	(3)
	τ	LM	τ
D	-0.0437*** (0.0144)	0.0263*** (0.0213)	-0.0358** (0.0146)
LM			-0.3020*** (0.10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560	4 560	4 560
Sobel 检验	$Z = -6.740, P = 1.581e-11 < 0.01$		
Bootstrap 检验	$Z = -6.040, P = 0.0000 < 0.01$		

表7第(2)列和第(3)列显示了中介效应模型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检验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

^①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增加中介效应的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进一步检验了中介变量的有效性,下同。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 D 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也即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实施有助于加快劳动力流动;第三阶段估计结果表明,中介变量 LM 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也即劳动力流动加快有利于缓解劳动力错配。进一步分析,结合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可知,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也就是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通过加快劳动力流动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原因在于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消除阻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制度壁垒,完善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使得劳动要素实现合理报酬,发挥工资对劳动力供求的调节作用,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从而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这与 Braakmann 和 Vogel (2011)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实现劳动力再配置,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至此,假说 H4 得到验证。

综上所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揭示了“新型城镇化→优化劳动力结构→缓解劳动力错配”和“新型城镇化→加快劳动力流动→缓解劳动力错配”的传导机制。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要素资源配置优化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 2003—2018 年 285 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样本数据,利用多期 DID 评估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是否能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在经过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劳动力错配的缓解效应是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规模等多个角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人口规模小等地区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有效发挥了试点政策对劳动力错配的缓解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和加快劳动力流动两个中介机制缓解劳动力错配状况。总体上,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实施改变了劳动力配置的空间分布格局,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配置结构,缓解了劳动力错配状况。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优化劳动力配置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破除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政策障碍。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加剧要素资源配置扭曲,不利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传统城镇化基础上,加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人口转向市民化,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运作制度,着力推进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配置。打破城市间、城乡间的流动壁垒和行政边界限制,促使高素质劳动力流向效率更高的城市,扩大劳动力共同市场规模,形成大一统的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第二,科学评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空间结构,优化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配置效应。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要素流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规模较小的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愈加明显。正如本文结论所示,新型城镇化在缓解中小城市劳动力错配效应的同时,可能进一步加剧大城市劳动力市场配置扭曲。要依据城市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减少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劳动力市场配置的各类不确定性,优化各

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配置效应,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第三,着力优化劳动力结构,推动劳动力要素市场合理配置。落实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任务,不仅仅要实现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同时还应提升劳动力基本技能和素养。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统筹兼顾城市发展与劳动力素质提升,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科学调整工资报酬,吸引周边城市更加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提升本地劳动力市场熟练工的比例,使得劳动要素实现合理报酬,推动劳动力要素市场合理配置,优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着力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 1.白俊红、刘宇英,2018:《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 2.卞元超、吴利华、白俊红,2018:《高铁开通、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财贸经济》第6期。
- 3.陈永伟、胡伟民,2011:《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季刊)》第10卷第4期。
- 4.崔书会、李光勤、豆建民,2019:《产业协同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研究》,《统计研究》第2期。
- 5.顾和军、沈坤荣、刘倩雯,2015:《中国劳动力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 6.郭晨、张卫东,2018:《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基于PSM-DID经验证据》,《产业经济研究》第5期。
- 7.季书涵、朱英明、张鑫,2016:《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 8.季书涵、朱英明,2017:《产业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4期。
- 9.姜安印、杨志良,2020:《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第3期。
- 10.李兰冰、刘秉镰,2020:《“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望》,《管理世界》第5期。
- 11.李晓萍、李平、吕大国、江飞涛,2015:《经济集聚、选择效应与企业生产率》,《管理世界》第4期。
- 12.梁泳梅、李钢、董敏杰,2011:《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区域发展的区域错配》,《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13.刘心怡、梁祎玲,2018:《城乡一体化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效果——基于倾向值匹配倍差法的检验》,《企业经济》第1期。
- 14.盛丹、王永进,2013:《产业集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的融资成本——来自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第6期。
- 15.王丽莉、乔雪,2020:《我国人口迁移成本、城市规模与生产率》,《经济研究》第1期。
- 16.熊湘辉、徐璋勇,2015:《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 17.于斌斌、陈露,2019:《新型城镇化能化解产能过剩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 18.余壮雄、李莹莹,2014:《资源配置的“跷跷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 19.袁志刚、解栋栋,2011:《中国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
- 20.张军涛、黎晓峰,2019:《中国的城镇化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生产率分布视角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第5期。
- 21.赵磊、方成,2019:《中国省际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及驱动机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5期。
- 22.赵志耘、刘晓路、吕冰洋,2006:《中国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6期。
23. Baldwin, R., and T. Okubo.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3):323-346.

24. Beck, T., R. Levine, and A. Levkov. 2010.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5(5): 1637-1667.
25. Braakmann, N., and A. Vogel. 2011. "How Does Economic Integration Influence Employment and Wages in Border Regions? The Case of the EU Enlargement 2004 and Germany's Eastern Border."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7(2): 303-323.
26. Hsieh, C. T., and P.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27. Melo, P., D. Graham, and R. Noland. 2009. "A Meta-analysis of Estimat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9(3): 332-342.
28. Okubo, T., P. M. Picard, and J. F. Thisse.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82(2): 230-237.
29. Restuccia, D., and R. Rogerson. 2008. "Policy Distortions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with Heterogeneous Establishment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1(4): 707-720.
30. Restuccia, D., and R. Rogerson. 2013. "Mis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6(1): 1-10.
31. Thi, N. P., and N. M. Khac. 2019.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f SMEs in Vietnamese Manufacturing Sector."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6(3): 290-303.
32. Tombe, T., and X. D. Zhu. 2019. "Trade, 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5): 1843-1872.

The Impac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Labor Misalloc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Identification

Wu Qingshan, Wu Yuming and Guo Lin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isallo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ilot policy of new urbanizatio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adopts the multipha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new urbanization on labor misalloc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i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lleviating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on labor mismatch, and th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parallel trend hypothesis test and placebo test.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w urbanization pilot polic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alleviating labor mismatch in areas with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mall urban population size. The impact mechanism test indicates that optimizing the labor structure and accelerating labor mobility are the main paths for the new urbanization pilot policy to play a mitigating effect.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factor resources.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 Labor Misallocation, Labor Structure, Labor Mobility

JEL Classification: O18, R11, R58

(责任编辑:赵锐、彭爽)